



外表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就是著名的渔阳里。靠近南昌路的100号是老渔阳里，靠近淮海中路567弄是新渔阳里。这看似寻常的石库门建筑却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点点星火，见证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投身建党伟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在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回到上海，继续租住在柏文蔚公馆，《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老渔阳里2号。这条弄堂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吸引大批满怀理想、家国情怀的年轻人——这里先后聚集了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他们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守护真理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的论争。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中国的进步人士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哪种思想才能救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曙光。在当时《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为了尽快让人们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急需对这本著作进行翻译出版。为静心完成翻译工作，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和日译本回到了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回到家的陈望道住在柴屋里，当时天气非常寒冷，柴房的陈设也非常简陋。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陈望道如饥似渴地钻研书中所蕴含的真谛，逐字推敲中文译文。有一天他的母亲特意包了粽子给他并嘱咐他在吃的时候记得蘸红糖水，过了一会母亲见屋里没动静就推开门看他在做什么，结果发现他正在奋笔疾书，嘴上全是墨水，边吃还边说粽子真甜。原来他因为太聚精会神，以至于把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墨汁吃了都浑然不觉。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苦和翻译中的困难，“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并在1920年8月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使得许多革命青年在比较推求各种思潮的过程中，体认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领会大道方能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传播革命火种的人，也是守护真理与理想的斗士。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联络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对非马克思主义发起论战，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彻底区分开来。当时梁启超和张东荪极力鼓吹以罗素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打着社会主义者的旗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张东荪与梁启超先后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主张中国不应以暴力革命来改变现

行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协社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撰文指出：中国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另外，以区声白和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也有不少支持者。无政府主义者也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因此他们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把斗争限制在经济领域。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纷纷撰文予以回击，他们认为不要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等同于有产阶级的老朋友，中国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这两场在上海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不但驳斥了反动谬论，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广泛传播、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同志辨明了真理，择定了信仰，并生死以之。

青春乐章在初心使命中奏响

渔阳里往东，不到1000米，就是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在这里诞生了一个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可能很少人知道，一大会址其实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当时一大的58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党员们大多和李汉俊一样，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家境优渥，或有体面的职业。他们本有大好的前程，犯不着踏上这条前途未卜、充满危险的道路，但是他们却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拍案而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脱离了原有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阶级趣味，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熏陶，他们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自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倡导劳工神圣的同时，皈依劳动阶级，实现了革命蜕变。李大钊曾热情讴歌“劳工神圣”，憧憬“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李汉俊把自己称为“不生产劳动者”，热切地与生产劳动者联合起来。同时，他们还将初心落在实际行动上——建党之初，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启发教育群众，组织工人开展各种斗争来争取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例如，李启汉就用他短暂却热血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